

第一章 从王阳明说起

本书所要讲的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这样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 16 世纪的下半期以及 17 世纪的上半期。然而要追溯起源头来，我们还得从明朝中叶王阳明的道学革新运动讲起。

王阳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领导起来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就是一种反朱学运动。当朱子在世的时候，正是道学的全盛时代，他以伊川为宗，上探明道横渠濂溪康节诸家以穷其源，出入程门诸子如游杨

谢吕尹胡之属以尽其流。其于同时各派 则左排陆学 右排浙学，毅然以道学正统自任。广收门徒，遍注群经。道学到他手里，可算是纲举目张，灿然大备。先儒说朱子集道学之大成，诚可以当之而无愧了。然而朱子讲学有时候嫌太繁琐。“字字而比，节节而较”。把许多道理支分节解 往往弄得不成话说。就如他讲“四端”既把“仁义礼智”四字并提以配“春夏秋冬”复并提“仁义”二字以配“阴阳”并提“仁智”二字以明“终始”更单提“仁”字以贯“四端”又有什么“四端相连而至”，“四端迭为宾主”种种说法。这样一分，那样一合，看他配置得多么巧罢！然而这不是讲心性，这只是变戏法，只是文字的游戏。又如他讲太极图说道：“盖中也 仁也 感也 所谓☵也，○之用所以行也 正也 义也 寂也 所谓☷也，○之体所以立也”。从仁义寂感上分阴阳 分体用，甚至从“中正”二字上也能分出阴阳体用来。这些地方 多亏他苦心体会。这简直是做起八股来了。陆象山在当时就挖苦他道：

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
其习熟足以自安。《与朱元晦书》

又《象山语录》载：

有立议论者 先生云“此是虚说”或云“此是时文之见”。学者遂云“孟子辟杨墨 韩子辟佛老 陆先生辟时文”。先生云“此说也好。然辟杨墨佛老者犹有些气道，吾却只辟得时文”。因一笑。

朱子依照着圣人样子，描摹刻画，制造出多少道理格式。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从象山看来，那只是一种“议论”，一种“时文”。这种时文化的道学，后来竟成为道学的正统。从南宋末年，到明朝中叶，完全成一个朱学独占的局面。所谓一代大儒，如许鲁斋、薛敬轩辈，都不过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道学至此，几乎纯成一种烂熟的格套了。于是乎首先出来个陈白沙，既而又出来个王阳明，都举起道学革命的旗帜；一扫二百余年蹈常袭故的积习，而另换一种清新自然的空气。打倒时文化八股化的道学，而另倡一种鞭辟近里的新道学。阳明赠白沙大弟子湛甘泉有一段话：

……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撰~~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静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道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别湛甘泉序》

这段话很能揭出陈王两家道学革新运动的共同宗旨。他们所反对的是“记诵词章之习”换句话说就是八股化的道学。这种八股化的道学 看着最平正 最周到 最近圣人 然而实际上直类乎“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 依门傍户 俯仰随人 比着杨墨佛老之各有其得者 尚相去绝远。“言益祥 道益晦 析理益精 学益支离”这是暗斥朱子 而认为八股化道学所自出。平心论之 朱子自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头等的伟大人物，但他那种烦琐支离的学风，实开后来道学八股化之渐，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二百多年的因袭墨守，朱学的流弊已十分显著。以这因缘，白沙阳明辈的道学革新运动应时而起了。

这次革新运动，发端于白沙，而成于阳明。我们分析阳明的学说，处处是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动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思想界实尽了很大的解放作用。首先看他讲“致良知”。提起这三个字 常使人觉得一片空灵 不可捉摸。不错 阳明有时候把良知讲得的确太玄妙 如什么“天植灵根”，“造化之精灵”，真算是玄之又玄。不过这里要分别看。假使这种学说就单是一个玄妙，再无其他东西，它还怎能会震动一世人心，在思想史上占那样重要地位？我们须要知道，这种学说虽然是很玄妙 但玄妙之中 却潜藏着一种时代精神 自有其不玄妙者在。阳明当临死的前一月，写信给聂双江，其中有一段说：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

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全书卷二

这样讲致良知，何等的亲切简易。这还能算玄妙么？他不管什么圣贤榜样，道理格式，而只教人照着自己当下那一点真诚恻怛实做将去。现现成成，甲不问乙借，乙不向甲赐。他以为虽古圣人也不过如此。《传习录》载：

问良知一而已 文王作象 周公系爻 孔子赞易 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全书卷三

各凭自己良知 同便听其同 异便听其异。道理没有死格 须从本源上流出 须是内发的。“君子一仁而已矣 何必同？”这已经是很自由很活动了。他更说道：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 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 明日良知又有开悟 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 亦

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全书卷三

各人良知有一定的分限，并且今天有今天的良知，明天有明天的良知。只要从良知上出发，非特我和你不必相同，就是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也不必相同，这里全没有定格。我们只须就当下分限所及，切实做去，使良知得遂其有机的发展，自然日有进境。无论自修或教人，都只宜这样办法。试再看《传习录》上这两段：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全书卷三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全书卷一

大人有大人的良知，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文王有文王的良知，武王有武王的良知。“武王自合如此做”，也就不必管什么尽善不尽善。童子自去致他那一点洒扫应对的良知，也无须去强学大人。各适其适，各得其所。彼非有余，此非不足。这样自由自在，把道

理完全看活了。他还有这一段话：

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
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
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
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
过。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
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
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
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
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全书卷三

跌了就起，起来便走，不管他进也罢，退也罢，誉也罢，毁也罢，我
只是老老实实，埋头自致其良知。除下良知，什么都看不见了。独
往独来，又奋迅，又坚决，把所有世习客套一扫而空。在这样意味
下讲致良知，不是也很切实很平易么？自然，这里面也有他玄妙
神秘的地方。良知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它会变化，会发展，今
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你的是那样，我的是这样。倘若不是另有
某种客观条件来决定它，那只好说它是“天植灵根”，造化的精
灵”了。然而不管它“灵根”也好，“精灵”也好，事实上他打破了道
学的陈旧格套，充满着自由解放的精神，不靠圣人而靠自己的良
知。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朱学更带些近代的色彩。

我们再看他讲“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理论，正是针对朱
学而发。朱子把知行看作两件事，并且主张先知后行。阳明却不

然。照他的意思，说个知已经有行在，说个行已经有知在。知行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是不可分离的。他最精要的解释是：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答顾东桥书》

阳明讲知行是从本体上讲的，也就是从良知上讲的。从良知上发出的“知”自然是“真切笃实”带情味的“知”，而不是揣摸影响的“知”；从良知上发出的“行”自然是“明觉精察”自觉的“行”，而不是懵懂乱撞的“行”。只用一个“致良知”，也就即“知”即“行”了。但这种说法似乎不易了解，又未免带点点谈玄意味。究其真精神之所在，只是不离“行”以求“知”而已。试看他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答顾东桥书》

这段话分析极精，以一念动处为行之始，“行”一步，“知”一步，“知”常与“行”相伴而不能分离。阳明虽讲“知行合一”，但因其针对着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所以事实上特重在“行”字。始于“行”，终于“行”，而“知”只是“行”的一种过程。他在《答顾东桥

书》中还有一段很痛快的话：

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 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 则必服劳奉养 躬行孝道 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 孳射则必张弓挟矢 引满中的 学书则必伸纸执笔 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 未有不行 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 而敦笃其行 不息其功之谓耳。盖学之不能无疑则有问 问即学也 即行也 又不能无疑则有思 思即学也 即行也 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 即行也。辨既明矣 思既慎矣 问既审矣 学既能矣 又从而不息其功焉 斯之谓笃行 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 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 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 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 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

朱子以学问思辨属“知”，以笃行属“行”。阳明却始终贯以一行“学之始已即是‘行’到最后仍是‘笃行之’。问、思、辨 都只是‘行’到滞碍地方，一种解决疑难的手段 并不是离‘行’而独立的。离‘行’而茫茫荡荡去求‘知’ 阳明最反对。他决不泛然问，泛然思，泛然辨，而一以当下现行为指归。普通以为阳明单提个“致良知”好像把什么读书稽古求师访友一切都抛弃了 总疑其太简。其实何尝如此。阳明只是不泛泛去求‘知’至于当下切身

所应当‘知’的，他还要尽量的‘知’，彻底的‘知’，一件也不遗弃。他说：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虽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得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去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全书卷三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答顾东桥书》

孟子说：“尧舜之智，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这个意思，象山已经发挥得极其警切，到阳明讲得更透澈了。颜习斋所谓“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不意陆王乃都先说到。阳明的教育主张，虽说以“成德”为中心，而并不妨害“达材”。他很能打破世儒无所不知而实一无所知的虚诞习气，而教人各就自己才性所近以成专长。又正大，又切实，又活动，在中国教育思想上实为一重要贡献。后来章实斋论浙东学术，对此别有发挥。他专在切要地方下功夫，一点

精力不浪费。你只须遵着良知所指示，直“行”下去。“行”不通时，它自然会使你“学”，使你“问”，使你“思”，使你“辨”。知“消纳在”“行”中，而学问思辨莫非所以致良知。这样进修方法和朱学实有毫发千里之辨。所以阳明答当时朱学代表人物罗整庵的信中说：

几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节条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于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王学决不像普通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它和朱学的差别也很微妙，不是随便一瞥就可以辨认出来的。凡什么读书稽古讲习讨论，朱子所从事者，阳明也未尝不从事。但在朱子，知是知，行是行，讲习讨论是讲习讨论，反观内省是反观内省，划然各为一事；在阳明，则提出个良知作头脑，讲习讨论也是致良知，反观内省也是致良知，无论“知”啦，“行”啦，都是从良知出发。只要一个“致良知”，就把什么功夫都“包罗统括于其中”。前者是多元的，而后者

是一元的。前者是头疼治头 脚疼治脚 而后者是真挾根源“，溥博渊泉，而时出之”。只有把一切功夫都消纳到一个致良知上而后功夫才实实落落 近里着己 问方是“切问”思方是“近思”行方是“笃行”。除下一切功夫别无可以致良知 而致良知却把一切功夫都点活了。这正是所谓“为之有要 作用不同”其妙处只在一转手之间。就由这一转手 而“博文”成为“约礼”的功夫“，惟精”成为“惟一”的功夫“，道问学”成为“尊德性”的功夫“，知”和“行”亦合为一体了。我常奇怪 阳明学说和后来的颜李学说，一个极玄妙，而一个极平实，本是绝不相容，但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点。他们都主张学不离行，都反对以读书为学。习斋骂当时学者 不是“博学”而是“博读 博讲 博著”这和阳明力辟口耳之学精神颇相契合。其学琴之喻，和阳明学射之喻尤绝相类。原来王颜两家之学所以极端相反者，因为一个专讲“心”，一个专讲“事物”。但实际上 阳明所谓“心”者 又和“事物”混一不分。他说：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全书卷三

离开“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别无所谓“心”。所谓“致良知”亦不外乎在种种事物感应上下功夫。象山早有“在人情事变上用功”之说 阳明亦有“在事上磨炼”之说。可见这班心学家虽然尽管在那里掉弄玄机，尽管在道学范围内变花样，兜圈子；但不知

不觉间早已渗入些新成分，为下一个时代开先路。在这种情形下，王学和颜学竟暗通了消息。总之，阳明并不反对读书稽古讲习讨论种种功夫，但这种种功夫须隶属在“致良知”一个总题目之下。他并不反对求“知”，但求知不能当作“行”以外的另一件事。从行动中，从生活中，自然涌现出来的问题，才是活问题；从行动中，从生活中，自然涌现出来的知识，才是活知识。这种思想，直到现代哲学界才可以见到它充分的健全的发展形态，然而早在四百多年前，阳明已经很明显的启示给我们了。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阳明学说，无论从“致良知”上或“知行合”上，处处可以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道学，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倘若我们再把他的“心即理”和“万物一体”等等说法都加以分析，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当更容易看出来，这里也不必一一赘述。我们只看他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顾东桥书》

他居然敢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只信自己的心。独断独行，自作主张。什么圣贤榜样，道理格式，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大胆的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大体说来，阳明实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他使道学中兴，使道学更加精炼。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新

道学了，已经渗入新时代的成分了。道学的体系未破，但其内部成分却已变更。他一方面大刀阔斧，摧毁传统思想的权威，替新时代做一种扫除工作；同时他又提出许多天才的启示，替新时代做一种指导工作。他既为宋明道学放出极大的光芒，同时却也为清代思想开其先路。清代思想一方面是他的反动，同时却也有许多地方是继承他的。当晚明时代，王学的余焰方炽，而正在解体。一部晚明思想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王学解体史。这个解体过程结束了，新时代也就出现了。在下面几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段历史过程怎样一幕一幕的展开。

第二章 王学的分化

在思想史上，一个大师的门下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未益分。”于是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形成许多小派别，而向各方面分途发展。孔子门下如此，程子门下如此，康德门下如此，黑格尔门下如此，阳明门下亦如此。王龙谿说：

良知宗说，同门虽不敢有违，然未免各以性之所近，拟议搀和。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现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符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致知别始终。此

皆论学同异之见 不容不辨者。《拟岘台会语》

观此可知王门诸子对于“致良知”这个总口号解释得如何纷歧。根据这些不同的解释，可以把他们分成许多派别。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细分的必要。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对于王门诸子是按地域分配的。他们共占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个学案（如算入止修学案则为八个）其中势力最大而又各自显出一种特色者，当推浙中江右泰州三派。但实际上各家主张有不能以地域限者。如王龙谿和钱绪山，虽同属浙中，但恰相对立。如聂双江和罗念庵，在未发已发问题上，不仅迥殊于浙中诸子，并且亦迥殊于同属江右之邹东廓欧阳南野黄洛村陈明水一班人也。大体说来，东廓绪山诸子谨守师门矩矱，“无大得亦无大失”，龙谿心斋使王学向左发展，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双江念庵使王学向右发展，事实上成为后来各种王学修正派的前驱。王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它向左右两方面分化的过程。左派诸子固然是“时时越过师说”，右派诸子也实在是自成一套。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却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王学由他们而更和新时代接近了。我们且把这左右两派分别讲述一下：

（一）左派王学

黄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谿而渐失其传。泰州龙谿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禅不禅姑不必论。但龙谿心斋时时越过师说，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形成王学的左翼；并且以使徒般的精神，到处传播阳明的

教义 热情鼓舞 四方风动 这倒是实在的。不管后来学者对于他们怎样排诋，但究竟不能抹杀他们在王学中的极高地位。

首先说王龙谿。他名畿，字汝中，浙之山阴人，与阳明为同郡。生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寿 86 岁。当正德嘉靖间，阳明归越讲学。龙谿年方 20 余岁 即往受业。时阳明门人众多，不能遍授，初来学者常使先见龙谿及钱绪山等诸高弟。龙谿坦易和厚，随机启发，所成就者尤多。及阳明卒后，曾一出仕为南京职方主事，稍迁致武选郎中。以忤宰相夏贵溪 不久即罢官去。此后退处林下四十余年 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皆有讲舍，而江浙为尤盛。年至八十，犹周流不倦。他勤勤恳恳的说：

区区身外百念都忘，全体精神只干办此一事。但念东廓双江念庵荆川诸兄相继沦谢，同心益孤。会中得几个真为性命汉子 承接此件事 方放得心。不然 老师一脉 几于绝矣。《与徐成身书》

区区八十老翁，于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师门一脉如线之传，未得一二法器出头担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于四方者 意实在此。《与沈宗颜书》

区区入山既深 无复世虑。而求友一念 若根于心，不容自己。春夏往赴水西白山之会，秋杪赴江右之会，岁暮始返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生惟此一事。六阳从地起，师道立则善人多。挽回世教，叙正人伦 无急于此。惟可与知己道也。《与萧来凤书》